



· 近代风云看船政 ·

丛书主编 王苏闽

船政与近代中国海军

CHUANZHENG YU JINDAI ZHONGGUO HAIJUN

船政学堂作为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对于中国近

代海军教育和人才培养无疑具有开创性和里程碑式的意

义。福州船政的设立即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亦即

海军铸才之基」。福州船政不仅开了近代中国海军的先

河，其影响更是远远超出了海军建设的领域。

柳燕妮 陈盛◎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近代风云看船政 ·

丛书主编 王苏闽

船政与近代中国海军

CHUANZHENG YU JINDAI ZHONGGUO HAIJUN

船政学堂作为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对于中国近代海军教育和人才培养无疑具有开创性和里程碑式的意义。福州船政的设立即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亦即海军铸才之基”。福州船政不仅开了近代中国海军的先河，其影响更是远远超出海军建设的领域。

柳燕妮 徐盛 著



丛书编委会

总策划 许毅青 赵学峰

主编 王苏闽

编委 黄有锋 林壬子 汤伏祥

张敏珍 吴登峰 林洁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THE STRAIT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船政与近代中国海军/柳燕妮, 陈盛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6. 12

(近代风云看船政/王苏闽主编)

ISBN 978-7-211-07516-4

I. ①船… II. ①柳… ②陈… III. ①造船工业—工业史—研究—中国—近代 ②海军—军事史—中国—近代
IV. ①F426.474 ②E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95414号

船政与近代中国海军

CHUANZHENG YU ZHONGGUO JINDAI HAIJUN

作者: 柳燕妮 陈盛

责任编辑: 林顶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话: 0591-87604366 (发行部)

网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fjpph7211@126.com

地址: 福州市东水路76号

邮编: 350001

经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福建建本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红江路69号6号楼一层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9.25

字数: 107千字

版次: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11-07516-4


定价: 35.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序

◎王苏闽



创建于1866年的福建船政，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巨大而深远。福建船政遗存被誉为近代史的活化石，福建船政的许多事件、众多人物与中国近代的发展息息相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虽因时代局限，福建船政的辉煌只延续了40多年。但在历史的弹指挥间，却展现了近代中国先进科技、教育、工业制造、西方经典文化翻译传播等丰硕成果，孕育了诸多仁人志士及其先进思想，折射出中华民族特有的砺志进取、博采众长，以及勇于创新、忠心报国的传统文化神韵。它是福州人民乃至中国人民涵泳百年不懈的历史骄傲，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瑰宝。

2012年11月29日，在国家博物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说：“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在《复兴之路》展览中，展出了11件船政文物，从强国强军的侧面彰显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为了实现民族复兴进行的不懈探索和追求。作为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发源地、近代中国培养科技队伍的基地和中国近代海军及航空业的摇篮，福建船政承载了无数仁人志士的“强国梦”。但甲申马江海战和甲午黄海海战船政英烈的玉碎和百余年中华民族的奋斗



发展史告诉世人，只有发展才能进步，道路决定命运。“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正如习总书记所说，而船政的历史正是这样的一个写照。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船政的过去和未来也深刻映射出应该怎样做，才能走出一条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

我们可以这么认为，福建船政是近代中国复兴之路的起航点，是“强国强军梦”的发端地……

从1866年到2016年，福建船政追寻着中国的梦想，追寻着时代的步伐，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蔚蓝色大海上扬帆起航，斩波劈浪。在福建船政创办150周年之际，由福州市马尾区策划出版这套“近代风云看船政”系列丛书，就是要全面梳理福建船政对于近代中国进步所产生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展示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做的不懈努力。铭记历史，开启未来，让我们沿着先人的追梦之路努力前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为实现中国梦而添砖加瓦。

目 录

- 第一章 近代中国海防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 001
 - 第一节 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海防意识的产生 / 002
 - 第二节 近代海权意识与海防思想的形成 / 012
- 第二章 福建船政——近代中国海军的摇篮 / 021
 - 第一节 福州船政局的诞生 / 022
 - 第二节 求是堂艺局与海军人才培养 / 029
 - 第三节 船政大臣的海防思想 / 045
 - 第四节 船政学子的海权、海防思想 / 054
- 第三章 海防大筹议与近代海军发展 / 065
 - 第一节 海防大筹议与中国近代海军构想 / 066
 - 第二节 转瞬即逝的阿思本舰队 / 072
 - 第三节 福建水师 / 076
 - 第四节 北洋水师 / 078
 - 第五节 船政海军在近代的发展 / 082

第四章 近代中国海军与近代海战 / 089

第一节 甲戌巡台 / 090

第二节 马江海战 / 093

第三节 甲午海战 / 101

第六章 船政学堂在近代海军的地位及影响 / 111

第一节 船政学堂为近代海军教育做出的主要成就 / 112

第二节 从船政学堂走出的近代海军将领 / 125

后记 / 138

|第|一|章|



近代中国海防思想
的产生与发展



鸦片战争的惨败，让清政府更加接受与认可中国的仁人志士们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新思潮。洋务运动中诞生的福建船政学堂，作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直接促成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建立与发展，更是对近代海权意识与海防思想的发展起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创办近代海军，走的是一条向西方学习的道路，学习的内容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购造坚船利炮，二是培养制造、使用坚船利炮的人才。船政学堂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海军学校，对于中国近代海军教育和人才培养无疑具有开创性和里程碑式的意义。将船政学堂的设立称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海军基础”“中国海军之始，亦即海军铸才之基”，都不为过。船政学堂不仅开启了近代中国海军的先河，其影响更是远远超出了海军建设的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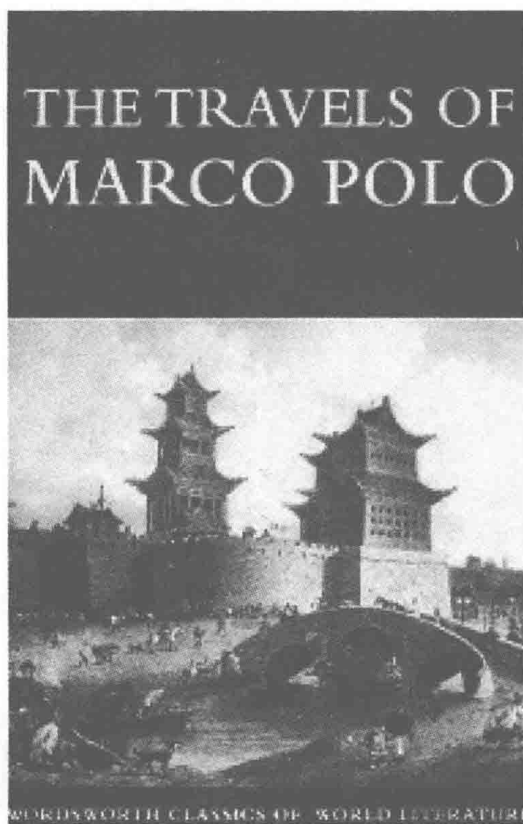
第一节 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海防意识的产生

明朝后期，北方的频频告急使得统治者开始把注意力从海洋转移到内陆，海防政策开始调整，以海禁代替海防，变原来的海上防守为海岸防守，弱化了军事发展与造船工业。到了清朝康乾盛世以后，由于承平日久，清朝的海防逐渐被人冷落。进入19世纪中期以后，清政府日趋衰微。伴随政治腐朽和经济落后而来的则是军事力量的空虚、海防的废弛。此时中国的海防千疮百孔，水师官兵腐化，纪律松懈，武备废弛，缺乏训练；水师战船规模小，火炮少，且年久失修，几乎无战斗力可言；各地炮台也是陈旧废弃，形同虚设；炮弹质量更是差不可言。与此同时，海防思想也变得更加保守，清代为水师订立明确

职责“防守海口，缉私捕盗”，重在巡哨，顾望风涛，多次下令将沿海战船改小，以便能快速灵活地稽查走私贸易。海禁政策使中国缺乏对外必要的经济文化交流，科技发展水平滞后。到鸦片战争时期，清水师战船仍然全部是木制帆船，战船上安炮最多10门，只能载七八十人，处于西方中世纪水平。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与迅速发展，尤其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日益强大。此时英军水师正由帆力船向蒸汽船过渡。其战船虽然多为木制帆船，但已经有部分以蒸汽机为动力的火轮船。与清代战船相比较，英军舰具有船身大、船体坚、配械多的特点，大船可载五六百人，安装火炮70余门。当时，英军舰船最大者长112米，宽20米，分三层，安炮72门，每船可载7000余人；小船长90米，安炮30门。英军大炮的射击距离可达10里以外，且可连续施放，准确率高。由此可见中英海上力量的差别可为天壤之别。当时一些讲求时务的官员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海防废弛将带来的恶果，纷纷进谏呼吁加强海防建设。

为了开拓国外市场，英国的魔爪伸向了自《马可·波罗行纪》问世后一直被西方羡慕、憧憬、向往的东方大国——中国。其实早



《马可·波罗行记》

在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已派遣“罗尔·阿美士德”号借访华使团之名对中国近海航道进行侦察测量。他们看到清朝装备最好的广东水师战舰仍都是旧式木帆船，最大的全长30多米，载炮30门，但全是旧式土炮。考察广东海防重镇南澳时，他们看到78艘类似福建商船的战船，发现南澳总兵旗下的5000多名水兵似乎只存在于花名册中。于是宣称“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只组成的整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一艘英国战舰”，并在1835年致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表示，只需1艘主力舰、2艘大巡洋舰、6艘三等军舰、34艘武装轮船和600名陆战官兵，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沿海中国海军的全部威信一扫而光，并把数千只商船置于我们的掌握之下。

自乾隆后期开始，清朝的统治日趋衰落。清政府仍以“天朝上国”自居，骄傲自大，闭目塞听。而同一时期的欧美列强已经有了长足发展，并把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作为他们扩大海外市场的目标。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上保守的“天朝上国”思想，使得一直以来中国人对外的产品需求很小。外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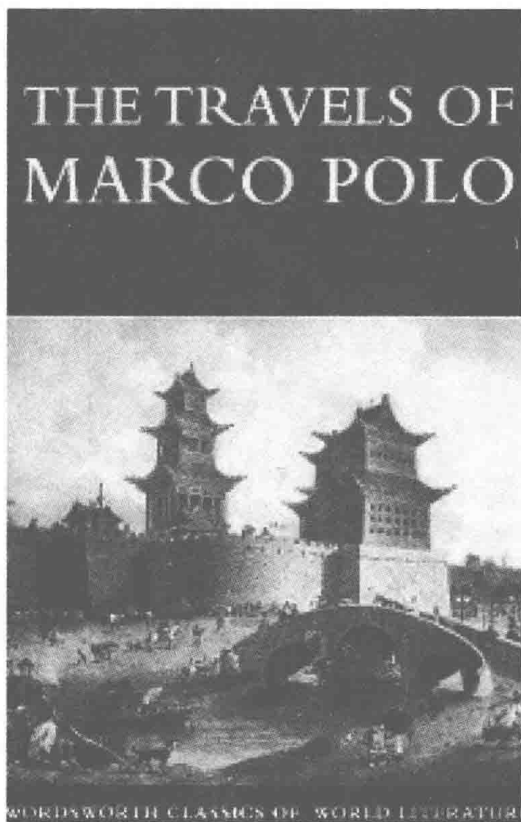


第一次鸦片战争

职责“防守海口，缉私捕盗”，重在巡哨，顾望风涛，多次下令将沿海战船改小，以便能快速灵活地稽查走私贸易。海禁政策使中国缺乏对外必要的经济文化交流，科技发展水平滞后。到鸦片战争时期，清水师战船仍然全部是木制帆船，战船上安炮最多10门，只能载七八十人，处于西方中世纪水平。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与迅速发展，尤其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日益强大。此时英军水师正由帆力船向蒸汽船过渡。其战船虽然多为木制帆船，但已经有部分以蒸汽机为动力的火轮船。与清代战船相比较，英军舰具有船身大、船体坚、配械多的特点，大船可载五六百人，安装火炮70余门。当时，英军舰船最大者长112米，宽20米，分三层，安炮72门，每船可载7000余人；小船长90米，安炮30门。英军大炮的射击距离可达10里以外，且可连续施放，准确率高。由此可见中英海上力量的差别可为天壤之别。当时一些讲求时务的官员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海防废弛将带来的恶果，纷纷进谏呼吁加强海防建设。

为了开拓国外市场，英国的魔爪伸向了自《马可·波罗行纪》问世后一直被西方羡慕、憧憬、向往的东方大国——中国。其实早



《马可·波罗行纪》



虎门销烟

银元，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城市对外通商，此外英国还享有协议关税。而由于清政府官员长期以天朝自居，不熟悉国际关系，在随后的《南京条约》两个补充文件谈判中遭受到了进一步的利益损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的签订使得英国得到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优惠国待遇和开设租界等特权。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由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华民族开始了一百多年屈辱、苦难、探索、斗争的历程。

从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鸦片战争的胜败体现了当时东西方科技的差距，尤其是军事上的巨大差距。但当时只有极少数人如林则徐、魏源等开始注意西方科技的进步，并著书介绍西方事物。绝大多数的士大夫并没有因鸦片战争而改变对西方的看法，更不用说向历来所轻视的“夷人”学习。此外，五口通商使得口岸的商人（或被称作买办）反而较一般知识分子更早接触、学习西方事物。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相继侵入中国。但是，他们不满足已经取得的特权和利益，蓄意侵犯中国主权，大肆进行经济掠夺。1854年，《南京条约》届满12年。英国曲解中美《望厦条

约》，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条约》的要求。主要内容为：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免交子口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法、美两国也分别要求修改条约。清政府表示拒绝，交涉没有结果。1856年，《望厦条约》届满12年。美国在英国、法国的支持下，再次提出全面修改条约的要求，但仍被清政府拒绝。于是，西方列强决心对中国发动一场新的侵略战争。

1856年10月，英殖民主义者利用“亚罗号”事件制造战争借口。“亚罗号”是一艘中国船，曾为走私方便在香港注册，但已过期。10月8日，广东水师在“亚罗号”上逮捕几名海盗和涉嫌水手。这纯系中国内政，与英国毫不相干。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扎在英国驻华公使、香港总督包令的指示下，致函清两广总督叶名琛，称“亚罗号”是英国船，捏造中国兵勇曾侮辱挂在船上的英国国旗，要求送还被捕者，赔礼道歉。叶名琛初据理力争，但旋又妥协退让，将全部人犯送英国领事馆。10月23日，英舰突然闯入虎门海口，进攻珠江沿岸炮台，悍然挑起侵略战争。接着，英军炮轰广州城，并一度攻入内城。当地军民英勇抵抗。英军因兵力不足，被迫于1857年1月退出珠江内河等待援军。

为了扩大侵略战争，英国政府于1857年3月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代表，率领一支海陆军来到中国；同时，向法国政府提出联合出兵的要求。此前，法国正以“马神甫事件”（又称“西林教案”）向中国交涉。所谓“马神甫事件”，是指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违法进入中国内地活动，胡作非为，于1856年2月在广西西林县被处死一案。该案此时尚未议结。1857年，法国政府将它作为侵略中国的借口，任命葛罗为全权代表，率军来华协同英军行动。

1857年12月，英法侵略军5600余人（其中法军约1000人）在珠江口集结，准备大举进攻。美国公使列卫廉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也到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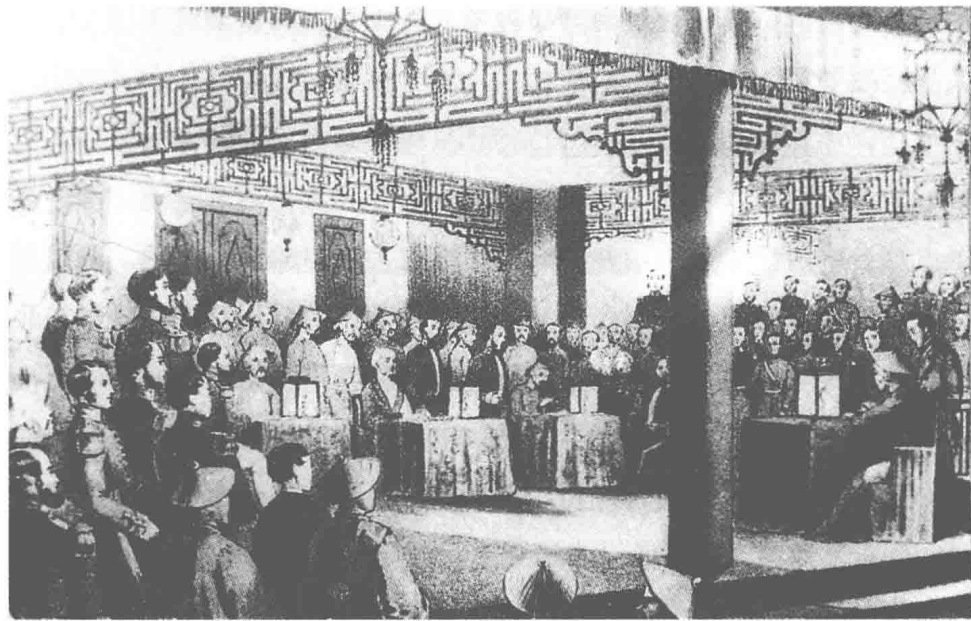


第二次鸦片战争

香港，与英、法合谋侵华。当时，清政府正全力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加上“饷糈艰难”，对外国侵略者采取“息兵为要”的方针。叶名琛忠实执行清政府的政策，不事守战。12月28日，英法联军炮击广州，并登陆攻城。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等率兵顽强抵抗，次日失守。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投降，并在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的监督下继续担任原职，供敌驱使。叶名琛被侵略军俘虏，后解往印度加尔各答。侵略军占领广州期间，当地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广州附近义民在佛山镇成立团练局，集合数万人，御侮杀敌。香港、澳门爱国同胞也纷纷罢工，以示抗议。

广州沦陷后，四国侵略者合谋继续北上，以便对清政府造成直接威胁。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指派全权大臣进行谈判。俄、美的照会还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咸丰帝一面命令清军在天津、大沽设防，一面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办理交涉，并把希望寄托在俄、美公使所谓“调停”上。英、法侵略者并无谈判诚意，只是以此拖延时间，加紧军事准备。5月20日，英法军舰炮轰大沽口炮台。驻守各炮台的清军奋起还击，与敌鏖战，但谭廷襄等毫无斗志，望风披靡，加以炮台设施陈陋，大沽失陷。英法联军溯白河而上，26日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清政府慌忙另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桂良等在英法侵略者威逼恫吓下，于6月26日、27日分别与英、法订立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中英《天津条约》共56款，附约1款；中法《天津条约》共42款，



1858年中英签订《天津条约》



附约6款。在此之前，俄、美公使利用“调停人”身份，以狡诈的手段，分别于6月13日、18日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12款、中美《天津条约》30款，攫取了除赔款外与英、法几乎一样的侵略特权。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离天津，沿海路陆续南下。咸丰帝此时对条约内容又感忧恐，令桂良在上海与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交涉修改《天津条约》，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条款，并设法避免英、法到北京换约。英、法政府并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种种特权，蓄意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1859年6月，在拒绝桂良提出的在沪换约的建议后，英、法、美各率一支舰队到达大沽口外，企图以武力迫使清政府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

6月25日，英法联军突然向大沽炮台进攻。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守军英勇抵抗，战斗异常激烈。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身先士卒，先后阵亡。激战结果，英法联军惨遭失败，损失舰艇多艘，死伤400多人，英舰队司令何伯受重伤。英法联军进攻大沽惨败的消息传到欧洲，英、法统治阶级内部一片哗然，叫嚣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占领京城”。

1860年2月，英、法两国分别派出15000余人、7000余人，扩大侵华战争。4月，英法联军占领舟山。随后，英侵略军占大连湾，法侵略军占烟台，封锁渤海湾，并以此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前进基地。俄国再次以“调停人”为名，配合英、法侵华战争。8月1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14日，英法联军攻陷塘沽，水陆协同，进攻大沽北岸炮台。守台清军英勇抗击，但清政府在大沽口战役获胜后幻想就此与英、法罢兵言和，无抗战决心，咸丰帝命令守军离营撤退。清军遂撤离大沽，经天津退至通州（今北京通县）。8月21日，大沽失陷。侵略军长驱直入，24日占领天津。清政府急派桂良等人到天津议和。英、法提出，除须全部接受《天津条约》外，还要增开天